

中国少数民族简况

傈僳族 羌族 普米族

怒族 独龙族

(征求意见稿)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编

中国少数民族简况

傈僳族 羌 族 普米族
怒 族 独龙族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编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

目 录

傈僳族.....	(1)
羌 族.....	(15)
普米族.....	(24)
怒 族.....	(32)
独龙族.....	(45)

傈 傈 族

(一)

傈傈族约三十余万人（1957年），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北部的怒江傈傈族自治州的碧江、福贡、贡山、泸水等县，约十一万余人。其余分布在丽江、保山两地区和迪庆、德宏、大理、楚雄等自治州以及四川的西昌、盐边等地。多与汉、白、彝、纳西等族人民交错杂居，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

怒江傈傈族自治州境内万山重叠，江河聚汇。拔海五千多米的高黎贡山雄峙于西，拔海四千多米的碧罗雪山屹立于东，山势陡峭，高耸云天；怒江和澜沧江分流其间，江水奔腾不息，高山夹着大江，形成南北走向的两大峡谷和一道道天堑，不但景色壮丽，而且成为祖国西南边疆的天然屏障。河谷和山顶相差达三千多米，气温悬殊很大。农作物主要有玉米，还有水稻、小麦、荞子、高粱、豆、薯类等。经济作物有麻、漆树、甘蔗等。山中遍布原始森林，以杉树最著名，有“植物宝库”之称。密林中有各种珍禽异兽，出产名贵的毛皮和山货，以及贝母、黄连等贵重药材。矿产和水力资源也很丰富。这些丰富的物产资源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傈僳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自治州内各族人民都通用傈僳语，靠内地的傈僳族除使用傈僳语外，也有能讲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的。傈僳族原有两种文字，一种是音节文字，字体象汉字，一字样代表一个音节，约有五百个字，仅在维西县的部分地区使用；另一种是帝国主义传教士为进行文化侵略而拟制的音素文字。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根据傈僳族人民的意愿于1955年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

傈僳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它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公元七世纪唐代的汉文史籍。根据史书记载和一些民间传说，傈僳族先民早期居住金沙江两岸和四川省西南部的木里、盐源、盐边一带地区。他们和彝族有密切关系。大约在四百年前，部分傈僳族才由金沙江两岸迁移到澜沧江和怒江流域。

解放前，傈僳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靠近内地的丽江、大理、保山和西昌等地区，傈僳族的社会经济已经是封建地主经济，生产力发展接近汉、白族的水平；居住在怒江边四县（碧江、福贡、贡山、泸水）的傈僳族，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主要从事农业，以采集和狩猎为副业。生产工具简陋，除有少量小铁犁、小铁锄及砍刀外，不少地区还使用竹、木农具。“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法还占主要地位。手工业和商业还没有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社会分工不明显，实行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的方法。在碧江、福贡等县开始出现了一些物物交换为主的初级市场。

与上述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在生产关系上，解放前怒江边四县傈僳族地区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但占有还不太

集中，农村阶级有了分化，尚存在着浓厚的原始公有制和家长奴隶制的残余。其主要表现：有未开垦的公荒地，保留有原始协作的“共耕”生产形式。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属于同一家族的二、三户成员共同耕种祖先所遗留下来的耕地或开垦家族公有荒地，共同劳动，产品平均分配；另一种是有共耕关系的双方都占有土地，在双方私有的土地上进行共耕协作。这种共耕关系不太稳定，可以随时加入或退出。一般采取共同劳动，产品平均分配。但是比较富裕的农户和村寨头人往往多出籽种少出劳动力，对贫苦农户进行劳力剥削，逐渐形成头人及富裕农户出土地、籽种，贫苦农民出劳动力的不平衡状态，这是从“共耕制”发展到租佃关系的过渡形式，从而使原始的“共耕制”逐步趋于崩溃。

此外，有土地而没有劳动力的人家，农忙季节由主人邀请家族和村寨内部成员共同协作耕种和收获庄稼，劳动完毕，主人只招待一些水酒及包谷稀饭，不付其他报酬。傈僳族称之为“瓦刷”。本来这是一种古老的原始协作方式，是不具有剥削性质的，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所提供的剩余产品不断增加，这种简单的酬劳就日益带来严重的剥削。从本民族内部日益分化出的富裕农民和头人，就经常利用这种形式剥削贫苦农民。

约自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叶，怒江地区曾存在过家长奴隶制的剥削形式，但是奴隶劳动没有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奴隶常以家庭成员和“养子”身份，由主人带领从事家务及田间劳动。主人可以买卖奴隶，但没有生杀之权，这些都反映了早期奴隶剥削的特点。到二十世纪初，由于奴隶的反抗，与邻近其他民族的接触和影响以及云南封建

军阀殖边队为了削弱土司的势力，加强自己的直接统治，在怒江地区实行“开笼放雀”，用武力强制释放奴隶，因而，家长奴隶制在解放前基本上已瓦解了。

解放前，各地区的傈僳族内部还保留了一些氏族名称和氏族制度残余。家族长与村寨头人一般是在本民族中有传统社会地位的老人。具有调解纠纷、领导进行“械斗”和缔结盟约的权力。但在解放前的几十年中，这些原有的自然公众领袖身份的头人，有些已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势力统治人民的爪牙。

解放前，傈僳族主要信奉多神，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有专门的宗教职业者“尼扒”、“古扒”从事祭鬼、卜卦等宗教活动。由于迷信，大量杀牲，对生产影响极大。十九世纪末叶，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基督教和天主教相继传入。帝国主义分子不仅用宗教麻醉人民，并煽动教徒脱离祖国，挑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等，犯下了一系列罪行。

由于受周围其他民族的影响，傈僳族的节日，与汉、白、纳西等族相近。阴历正月过年，人们首先要给耕牛喂食盐，以表示尊敬耕牛的劳绩。六月过“火把节”。怒江地区及维西、兰坪一带的傈僳族于十月间玉米收获后的半个月内在村寨场子上高烧篝火，男女边唱边舞，通宵达旦。由于大量杀牲，消耗粮食，浪费人力，对生产不利。

傈僳族喜欢黑色的服饰。妇女着短衣长裙，头上喜戴红色料珠和贝壳串成的装饰品，颈上也挂着很多用彩色料珠串成的项圈。

傈僳族能歌善舞，举凡结婚、打猎、盖房子以及收获时节都要尽情地歌舞。民间创作极其丰富。傈僳族人民创造出许多喜闻乐见的富于民族特色和生活感染力的诗歌曲调，按其歌唱的内容可分为生产调、逃婚调、打猎调、盖房调、收获调等十多种。多是以叙事诗的形式即兴演唱的。他们用这些曲调配合着琵琶、四弦及口弦，唱出内心的激情。舞蹈形式丰富多采。有反映生产劳动的“秋收舞”、“猎人舞”等，动作活泼，矫健有力。但在万恶的旧制度下，傈僳族人民的文艺生活受到压抑而得不到应有的发扬。

(二)

解放前，广大傈僳族人民受着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地主、土司、头人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这三座大山压得“苦傈僳遍山跑”，过着“岩洞当住房，麻片当衣裳，火塘当被盖，野菜当食粮”的悲惨生活。据碧江县俄夺罗大队的统计，仅解放前的十年里，这个不到一千人的山村，就有二百三十个贫下中农被官府、土司、头人、地主活活地折磨死了。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仅门户捐一项，碧江县平均每人负担玉米四十二斤半，占全年粮食收入的21%。还有奸商、高利贷分子与反动官府勾结，对傈僳人民进行野蛮的剥削。

傈僳族贫下中农悲愤地说：“旧社会，澜沧江的水，日日夜夜流的是傈僳人民的血和泪！怒江的激浪，世代代呼喊着傈僳人民的仇和冤！”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富于革命传统的傈僳族人

民在历史上曾连续地爆发过多次反帝、反封建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起义群众提出“杀官安民”的口号，捣毁了“官府”，焚烧了教堂，驱逐了帝国主义间谍分子，给予国内外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在整个十九世纪的百年中，傈僳族人民曾掀起了无数次声势浩大的反清大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是1801年在维西爆发的以傈僳族农民领袖恒乍绷为首的，有傈僳、怒、白、汉、纳西等各族人民参加的反抗康普土司压迫的大起义。这次起义历时两年多，革命烈火烧遍了八个县，先后消灭了康普土司等大小头目以及清朝官兵数千名，有力地打击了清朝反动统治，它在我国各族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起义领袖恒乍绷的英雄事迹现在还为人民所传颂。

二十世纪以来，傈僳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从未间断过。1907年，傈僳族与藏、怒等族人民一道，愤怒烧毁了法帝国主义在贡山白哈罗霸占土地修起的教堂。1908年，傈僳族人民杀死了以“探险”为名潜入福贡的德帝国主义武装间谍布伦胡伯。1911年，为抗击英帝国主义侵略军武装占领我国领土片马、古浪、岗房等地，傈僳、景颇等族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1913年，碧江县理悟底村傈僳族人民在一夜之间杀死了云南封建军阀殖边队的反动官兵二十五人。1935年，以傈僳族瓦业为首在福贡地区开展了反抗国民党设治局苛派勒索的斗争，杀死了设治局长，占领设治局二十多天。1937年，福贡木占甲的傈僳、怒等族人民焚毁当地的教堂，不准帝国主义分子从事破坏活动。1941年至1943年间，傈僳族人民向侵入云南西部的日寇进行了阻击，使日寇闻风丧胆，被迫不敢越过怒江。在反抗国内外反动派的革命斗争

中，傈僳族人民始终和其他民族人民一起，同仇敌忾，紧密团结，并肩作战，为捍卫祖国边疆的安全、维护祖国的统一和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三)

碧罗雪山升起了红太阳，红旗插遍了怒江两岸。傈僳人盼来了恩人毛主席，盼来了救星共产党。1950年初，亲人解放军来到了祖国西南边疆云南省，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解放了怒江地区。傈僳族人民获得了解放。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首先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建立起人民政权。傈僳族劳动群众真正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

为了进一步实现傈僳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1954年8月23日，成立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促进了傈僳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自治州的成立是傈僳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依据解放前傈僳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党和政府在不同地区通过不同途径先后完成了民主改革的任务。如在怒江自治州沿边的四个县的傈僳族地区和德宏自治州的傈僳族分布的山区，采取了大力扶助他们发展生产和文化，通过合作化的道路，结合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必要的民主改革，帮助他们逐步地、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在靠内地的傈僳族地区，则通过民主改革的办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其中又根据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及复杂的民族关系等情况，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方针。如在丽江等五县的傈僳族地区，实行

了和汉族地区土改相同的土地改革；在其他傈僳族地区实行了“和平协商”的土地改革。自1953年到1956年，在上述各个地区先后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由于不同地区社会改革采取的不同方式，因而各地区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在直接过渡的怒江傈僳族地区，在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到1958年大跃进时，形成了生产和合作化双跃进的局面。到1959年，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和消灭了合作化以前的阶级剥削关系和原始公社残余。1969年，怒江边四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到1972年全州五个县共建立了二十七个公社，二百一十三个大队。而在靠近内地的傈僳族地区，则在1958年初，已经先后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在1958年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把傈僳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引向了更高的发展阶段。

正当傈僳和其他各族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边疆的大好革命形势下，阶级敌人不甘心死亡，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边疆也大刮“四大自由”、“三自一包”妖风，砍掉了傈僳族地区60%多的合作社。大搞“和平边疆”、“礼貌边防”，鼓吹阶级调和，取消阶级斗争，从右的和极“左”的方面竭力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广大傈僳族人民坚决顶住这股逆流。傈僳族人民说：“一根筷子容易断，千根筷子折不断，只有‘组织起来’，才是傈僳人的共同出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一类骗子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傈僳族人民更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决心。1968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革委会成立之后，傈僳族地区的形势越来越好，各族人民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应用毛泽东思想，涌现出碧江俄夺罗大队等一批先进单位和个人。随着毛泽东思想大普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推动了各条战线斗、批、改运动深入发展，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光辉指引下，自治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到处呈现团结战斗、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

在农业方面，怒江自治州水田面积和固定耕地都比解放前增加了一培多。1964年的全州的粮食总产量比解放前增加了两倍多。1973年全州固定耕地五十七万多亩，新修水利工程二千九百九十九处，新开水田四万五千亩。随着“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傈僳族地区大寨之花遍地开，粮食连年获得丰收。过去需要国家供应大批口粮，现在已能自给，有的地区自给还有余。1973年全州粮食总产量比成立自治州时增长近一倍。兰坪县营盘公社恩棋大队苏罗寨生产队的傈僳、白族社员和干部鼓足干劲“学大寨”，改天换地夺丰收，农业生产蓬勃发展。1973年粮食总产量达三十四万九千多斤，平均亩产达八百一十四斤，成为自治州第一个粮食产量跨《纲要》的生产队。碧江县东方红公社俄夺罗大队，1972年全大队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一百二十五万斤，比1952年增加四倍多，比1965年的七十八万斤增加了60%，成为自治州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之一。该县抗大公社傈僳、怒、汉等族社员和干部经过了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73年，全公社开出大寨式梯田梯地二千多亩，相当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两倍，在高黎贡山上开凿了引水沟渠十三条，总长一

百一十华里，初步改变了历史上“望着怒江流，滴水贵如油”的干旱面貌，1973年粮食总产量一百九十一万斤，比1965年增长一倍多。猪、山羊、大牲畜也成倍增长。傈僳族贫下中农兴奋地说：“傈僳边寨喜事多，山山红旗山山歌，大寨花开雪山顶，五谷丰登牛羊满山坡，党的基本路线指方向，唱不完社会主义幸福歌”。

傈僳族地区工业也有了较大发展，解放前怒江地区根本没有工业。解放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修整风运动的深入，狠批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民族地方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到1973年，全州有农机具、汽车修理、稀有金属、制盐、制糖、酿酒、榨油、制药、造纸、印刷、砖瓦、木器、建筑、发电、缝纫、陶瓷、制革、食品加工等二十五国营厂矿企业，以及六十三个集体兴办的企业。民族地方工业的发展，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社员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傈僳族的第一代工人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的滋润下，正在迅速茁壮成长。现在全州工人中少数民族工人占70%，其中傈僳族工人占50%多。随着“工业学大庆”运动深入开展，傈僳族地区社会主义工业建设获得进一步发展。

高原天堑变通途，傈僳族地区交通事业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着。这里山高水险，深谷纵横，交通非常闭塞。在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之间，过去不仅没有一里公路，许多地区连驿道都没有。长期以来，人背马驮，成了当地唯一交通运输方式。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发展山区的交通事业。“自古碧

“罗雪山一条路”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到1973年，共修建了四百三十四公里长的公路和一千二百二十公里的人马驿道，此外，在江河上共架起了十八座大的钢索吊桥和二十座河桥。自治州各县基本上都有了公路，63%的公社也通了汽车。从而代替了古老的竹溜索，根本改变了怒江峡谷交通闭塞的落后面貌，有力地驳斥了帝国主义者“要在怒江上架桥比登天还难”的无耻谰言。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密切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增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促进了全州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傈僳族地区民族贸易工作也有了显著发展。现在，自治州所属的县、公社、大队都建立了民族贸易商店或小组，偏僻山寨也建立了代购代销点。1972年商品收购总值比解放初期1952年增长了九点五倍，纯销售总值增长了十二点七倍，出现了购销两旺的繁荣景象。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傈僳族地区文化教育有了很大的跃进。过去国民党统治怒江二十多年，只有两个中学生。解放后，从1954年到1964年国家先后拨出了四百二十多万元经费创办学校，还从内地派来了大批优秀教师。1972年，怒江自治州已创办了五所中学，在校学生达二千多人。小学由文化大革命前五百多所发展到九百多所。学生中90%以上是劳动人民的子女。今天傈僳族人民已经有了本民族的第一批大学生、教师、医生、农业技术人员和科学技术人材。

医疗卫生事业，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傈僳族地区有了迅速发展。解放前，傈僳族人民有了病，“杀牲祭鬼”，求神拜佛，长期处于无医无药的悲惨境地。怒江地区没有一个医疗机构，疫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如解放前

仅几十户人家的片古岗山村，在1930年一次疟疾流行中，就有七十多人死亡，到处是一片荒凉凄惨情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狠批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卫生工作蓬勃发展。国家从内地派来大批医生，充实医务工作者队伍。国家医疗机构由解放初期新建的五所发展到1972年的四十一所。医务人员由1952年的四十一人发展到1972年的四百四十九人。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怒江、贡山、福贡、泸水四个县的85%的医务人员分布在农村的社、队，国家拨给的卫生经费的80%都用在农村。怒江自治州已做到州、县有医院和卫生防疫站，公社有卫生所或地区医院，大队有合作医疗站和卫生室，大部分生产队有本民族赤脚医生或卫生员。1972年，全州共培训出三百二十四名赤脚医生和一千三百零四名接生员、卫生员，他们活跃在怒江两岸雪山峡谷，热情地为各兄弟民族群众治病防病，还广泛利用中草药，大搞群防群治，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使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率显著地下降，从而保障了各族人民身体的健康，有力地推动了边疆经济生产的发展。

自治州成立二十年来，地方党组织积极发展少数民族优秀分子入党，大力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1973年全州少数民族党员比1958年增加五点六倍，少数民族干部比1953年增加了二点四倍。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州发展了少数民族新党员一千三百多名，占全州纳新党员92%，使全州80%的生产队都有了党员；同时还培养和选拔了一千五百多名少数民族干部，全州少数民族干部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加了一倍多，其中州、县、公社、大队

干部中，少数民族干部占90%。少数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紧密团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积极发挥作用。

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边疆各族人民遵照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教导，播下民族团结的种子，开放出民族团结友谊之花。梁河县小厂公社三岔河生产队，原是一个单一的傈僳族生产队，1969年松坡汉族生产队遭火灾后，傈僳族贫下中农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主动地把遭火灾的汉族兄弟接进村寨，帮助他们建立新居，成为傈僳、汉族杂居的生产队。几年来，两族贫下中农亲如手足，团结一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创新业，使集体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社员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1972年向国家交售公、余粮二万二千四百多斤。各族人民紧跟毛主席，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边疆做出更大的贡献。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深入发展，傈僳族地区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有如雨后春笋。各族贫下中农参加管理学校，管理商店，办好合作医疗，建立电影队，普及广播网等等，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和发展，大大促进了生产，巩固和发展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这里千百年来结绳刻木记事、刀耕火种、缺医少药的落后历史，从此一去不复返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着傈僳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共同走进了灿烂的社会主义时代。抚今思昔，傈僳族人民满怀激情地说：“千年的苦根是毛主席领导我们挖掉，万代的甜源是共产党领导我们开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是边疆各族人民的幸福线和指路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自治州傈僳

族和各族社员、干部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办起了二百一十多所农村政治夜校，几年来，涌现了一批学习骨干，在批林批孔斗争中，这批骨干已发展成为七千七百多人的理论队伍。他们遍布怒江峡谷的村村寨寨，带动和辅导各族人民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一伙骗子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冲击边疆经济建设，妄图破坏民族团结，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特别是对林彪大肆鼓吹孔孟的“中庸之道”，大搞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并联系本民族地区一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土司、头人乘机散布的“鸡蛋没有两样，傣傣不分两家”、“民族亲，氏族亲，打断骨头连着筋”等反动谚语、格言进行揭露批判。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孔老二和反动的土司、头人都是一丘之貉，他们散布“中庸之道”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麻痹劳动人民的革命斗志，不要“犯上作乱”，以便他们顺顺当当复辟资本主义，使我们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真是可恶之极。许多傣族贫下中农忆苦思甜，以对比解放前后巨大变化的活生生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林彪、孔老二的“天才论”、“天命观”、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恶毒攻击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随着批林批孔不断深入、普及、持久的开展，广大傣族人民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得到不断的提高，坚决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夺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而奋勇前进！